

“一带一路”系列丛书

“一带一路” 投资风险研究： 以中亚为例

“YIDAI YILU”
TOUZI FENGXIAN YANJIU
YI ZHONGYA WEILI

马斌 /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一带一路”系列丛书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研究： 以中亚为例

马斌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研究：以中亚为例 / 马斌著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11

(“一带一路”系列丛书)

ISBN 978-7-5663-1719-3

I. ①—… II. ①马… III. ①对外投资-直接投资-
投资风险-研究-中国 IV. ①F83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8416 号

© 2016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研究：以中亚为例

马 斌 著

责任编辑：强晓洁 胡晓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100029

邮购电话：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010-64492342

网址：<http://www.uibep.com> E-mail：uibep@126.com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成品尺寸：170mm×240mm 13.75 印张 246 千字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1719-3

定价：49.00 元

本书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民主援助’对中亚政治发展的影响及我国对策研究”(批准号 13CGJ0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研究”(课题编号 15JJD790006)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序　　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后就在不同的方向探索前行。其实践活动在借鉴相关理论成果的同时，也遵循着相对独立的逻辑。本书选择“一带一路”投资风险中的政治风险作为研究主题，主要与下列事实有关：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大众眼中的动荡之地。且不说阿富汗、叙利亚等武装冲突不断的国家，即使是部分中亚、中东国家，在大家看来也蕴藏着大量的风险和挑战。于是，一系列相关问题就被频繁提出：“一带一路”能否经受住冲击？“一带一路”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什么影响？是加剧冲突？还是缓解矛盾？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弄清楚这些地区可能出现的风险是什么，包括哪些因素，具有何种影响等。

其次，“一带一路”是不是一项战略规划。“一带一路”提出后，立即引发了关于它是不是战略的讨论。有的观点认为用“倡议”一词较为中性，能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担忧，有的观点认为从其规模、影响等方面看，它就是一项战略。事实上，这种争论虽然重要，但却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因为，在不少中央部委的公开资料中，比较明确地使用“战略”一词来描述“一带一路”；但它们在使用“战略”一词时，又主要围绕特定行业领域，而不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范畴中的“战略”范畴。不过，这种讨论已经引起外部世界的担忧，从而影响到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

再次，中国企业是不是高风险偏好的群体。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企业，特别是央企的海外投资有一项争论就是：是否偏好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在欧美学界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中国的央企是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因为把大量资本投向拉美国家常被认为是高风险的投资。对此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们则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集中到非洲、拉美等高风险国家，是因为受到欧美国家及企业的阻碍，缺少其他选择。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都能找到一些支持其立场的证据和素材。

最后，中国成为海外投资大国。中国企业经过前一时期的人员走出去、商品走出去后，已经进入到资本走出去的阶段，而且，又努力实现从“投资大国”向

“投资强国”的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尝试推动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从而形成互利共赢的格局。但是，外界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在借助资本优势输出落后产能；中国企业和资本的进入将给本国经济带来毁灭性影响。

当然，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各种各样的非市场风险也是促使笔者选择政治风险作为研究主题的重要原因。尽管学界和业界已有不少关于国家风险评级的研究成果，但将“一带一路”政治风险作为专项进行分析的较少。本书尝试将“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走出去”结合起来，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见解。当然，本书主要是对作者开展的相关研究的前期成果进行了梳理，囿于作者学识，在系统性、深入度等方面都存在尚待完善的地方；随着后续研究的推进，希望对本书中提及但未做详细论述的问题，及材料、数据使用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行修正、完善，从而以更好的成果与学界同仁交流。

本书在成稿和修改过程中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编辑胡晓雪女士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作 者

2016.9

目 录

导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文献综述	6
(一) “一带一路”研究	6
(二) 国内的中亚研究	9
三、内容框架	13
第一章 海外投资风险分析：现状与路径	15
一、海外投资风险研究的发展	15
二、海外投资风险分析的路径	17
(一) 政治风险的核心内涵	17
(二) 政治风险的主要诱因	21
(三) 政治风险的演变路径	23
本章小结	27
第二章 “一带一盟”对接的平台与挑战	29
一、地区整合的影响	30
二、对接制度平台弱	34
(一) “带盟”对接的制度基础	35
(二) 作为制度平台的上合组织	37
三、多元的替代选择	53
四、“带盟”对接前景	54
本章小结	57
第三章 “新丝路计划”的进展与影响	59
一、美国在中亚的主要利益	60
(一) 综合性的安全利益	60
(二) 多元化的经济利益	65
(三) 多层次的政治利益	68

二、中亚战略地位的变化	68
(一) 早期的战略角色	69
(二) 近期的战略调整	71
三、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	80
(一) “新丝路计划”的框架	80
(二) 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88
本章小结	91
第四章 沿线地区局势与“一带一路”投资风险	93
一、中亚非传统安全挑战	94
(一) 挑战的主要来源	94
(二) 引发的政治风险	101
(三) 中亚国家的应对	104
二、阿富汗安全局势变化	105
(一) 安全局势的变化	106
(二) 导致变化的原因	108
(三) 产生的主要影响	114
本章小结	117
第五章 目标国内部局势与“一带一路”投资风险	119
一、制度转型目标与过程	120
(一) 中亚转型的主要目标	121
(二) 中亚国家转型的过程	123
二、当前制度特点与挑战	127
(一) 制度转型的结果	127
(二) 面临的主要挑战	132
本章小结	136
第六章 目标国角色认知与“一带一路”投资风险	137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137
(一) 中亚地区环境的特点	138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外交的内容	143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外交的前景	152
二、对中国角色的消极看法	159
(一) 中亚的“中国威胁论”	159

(二) 中亚的“中国责任论”	164
本章小结	166
结 论	167
一、充分估计投资风险	169
二、明确各行为体定位	170
参考文献	173
(一) 中文书目	173
(二) 俄文书目	180
(三) 英文书目	181
附 录	185
附录一 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	185
附录二 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	190
附录三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	196
附录四 “一带一路”对接的联合声明	206

导 论

本书以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目标是试图为识别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经营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提供思路，而非要围绕政治风险的识别——预防——应对提出一个全景式的解决方案。本书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过的主要地区——中亚为例来探讨“一带一路”沿线的政治风险问题。

一、研究缘起

总的来看，中国企业在海外资产规模的增加，中国公民在海外活动频次的增长，都使中国巩固和维护海外利益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相关研究的紧迫性也不断增大。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角色，影响力不断提升。2014 年，中国首次成为国际市场的资本净输出国；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 2002 年的 45.6 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37.5%。^①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连续 13 年的增长，达到 1 150.2 亿美元。^②目前，中国已有超过 15 000 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了超过 40 000 家的境外企业。^③截至 2015 年底，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各类劳务人员超过了 100 万。大量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遭遇各不相同。它们中既有通过国际市场获得的技术、市场、资源实现进一步发展的，也有进入国际市场后屡经波折、损失惨重的。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出现两极分化的结局并不意外，因为，在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国际市场上，任何国家的企业进入其中后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相关研究显示，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的企业相比，它们在跨国经营时面临着更加难克服的挑战。“以

^① 中国从 2003 年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故对比的基点是 2002 年。参见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商务部召开“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5 版）〉专题新闻发布会》，2015 年 12 月 9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lfw/201512/20151201206646.shtml>。

^② 此处的对外直接投资指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连续 13 年增长”，2016 年 1 月 19 日，<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ywzn/xgzx/guonei/201601/20160101237307.shtml>。

^③ 察哈尔学会：《私营安保公司：中国海外安全的供给侧改革》，2015 年 12 月 3 日，第 2 页。

海外并购为例，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 20 年的大型企业兼并案中，中国的失败率为 67%，远高于 50% 的全球平均失败率。”^①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失败的原因不一而足，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都可能出现此类原因。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从各自学科角度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学科对该问题的关注起步相对较晚，2005 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遇挫、2011 年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遭叫停等促使学界对地缘政治、利益集团等给中国海外投资带来的影响关注的越来越多。其中，部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政治风险的分析上。

政治风险是企业跨国经营难以回避的问题。有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倾向于对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投资^②，特别是在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其“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最穷且最不透明的国家（许多位于非洲）的资源开采项目上”^③，这使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当时面临的政治风险较高。但是，在中国企业走过了海外投资的早期阶段，开始把更多资源投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后，政治风险问题依然不时刺激国人和资本的神经，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由此可见，政治风险管理已经成为中国海外经济合作的必修课。与之相适应，政治风险研究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经营的重大课题。

在学界对中国海外投资经营风险问题研究逐步深入的同时，中国政策也发生重大变化。自 2013 年 9 月开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逐渐被“一带一路”框架所统领。“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中国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的新战略，不仅涉及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变革和走向，还涉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多层次合作，更涉及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国际地位。这意味着此前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风险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风险问题的研究。而“一带一路”实践的快速进展，更进一步激发出对“一带一路”进行更加全方位研究的需求。这其中，政治风险就是重要方面。

2013 年 9 月 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 10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

^① 赵晶、王根蓓：《创新能力、所有权优势与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 年第 2 期，第 100 页。

^② Peter J Buckley, L Jeremy Clegg, Adam R Cross, Xin Liu, Hinrich Voss and Ping Zheng,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38, 2007, p.499.

^③ 乔希·诺贝尔：“中国投资遭遇海外政治风险”，FT 中文网，2015 年 2 月 13 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639>。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时提出中国愿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二为一，被称之为“一带一路”。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标志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式面世。之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不断取得进展。

首先，“一带一路”机制建设进展良好。机制建设是“一带一路”发展的基础。责任明确、效率优先的内外联动机制初步形成是“一带一路”建设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在国内，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张高丽担任组长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统筹引领“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目前，中央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全国各地方政府，大都已制定出参与和对接“一带一路”的具体方案。在国际上，截至2016年8月，中国已与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与近20个国家建立起产能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为“一带一路”提供关键金融支撑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已经启动运营，后者更已经参与到中国和巴基斯坦、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欧盟部分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当中。

其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持续深化。一方面，“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济合作规模令人瞩目。据统计，2015年与2016年前10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总额为268.9亿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为1770.3亿美元，增长迅速。^①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引领下的合作典范不断形成。从“一带一路”启航至今，中国与沿线国家联合打造了渝新欧铁路、中亚班列、中哈物流园区等设施联通的代表性项目，中白工业园等产能合作引领性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等综合性项目，此类创新和努力对“一带一路”建设有良好示范效应。

2016年3月，中国发布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三五”规划）把“一带一路”明确定位为新时期中国建设全方位开放格局的统领。该定位不仅使“一带一路”作为顶层设计对当前和今后中国对外交往的指引意义更加突出，而且还将

^① 本数额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统计而得。参见商务部合作司，“2015年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贸合作情况”(<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l/tjsj/201601/20160101239838.shtml>)、“2016年1—10月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合作情况”(<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l/tjsj/201611/20161101884408.shtml>)。

将进一步统筹国内各地区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培育和提供新支撑点。今后，结合“十三五”规划培育、选择和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将是推进“一带一路”工作的重点。

综观此前的“一带一路”建设，早期收获项目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在具有良好基础的合作项目作为先期收获启动后，“一带一路”培育和开发新项目的难度将逐渐增大。而与东道国政府政策、跨国企业选择和第三方行为等密切相关的障碍对“一带一路”消极影响也将更加显著。

首先，参与国政府政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对接“一带一路”时，政府是双边和多边合作的项目设计者、利益保障者，它们的政策如果存在问题将会对“一带一路”整体产生负面影响，阻碍“一带一路”在相关节点的推进。此类政策障碍可能源于现实利益冲突难以协调，可能源于制定者估算决策失误，可能源于外部环境突然改变。不管原因何在，它只要出现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环境和未来前景。

其次，参与企业的选择。企业是“一带一路”主要参与方和实际推动者。“一带一路”在国家层面可称之为一项宏观战略，但是，只有当“一带一路”在企业层面落地并以企业为主体切实开展业务后，才能被认为是真正运转。如果企业对此没有积极性，那么，“一带一路”就难以从理想变为现实；如果企业对此过于积极，那么，“一带一路”同样存在被歪曲、被扰乱的风险。比如，能源领域的“一些项目具有明显的政治因素，而另一些似乎只是搭上了‘一带一路’这条大船”；部分中国企业在实施项目时的“非商业性考虑”有可能导致它们为了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而支付溢价。^①

最后，第三方的行为。“一带一路”贯穿中亚、非洲、中东、东南亚、欧洲等广大地区，但并非把沿途所有国家都包容在内。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秉持的开放包容原则是以现实对接项目相联系的。如果沿线国家无力提出对中国企业有吸引力的项目，那么，它从“一带一路”战略中获益的前景就会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后沿线国家之间会出现利益分配不均的情况。此外，“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抱着特定立场的区外大国等对中国的战略持怀疑、猜忌态度，它们采取的措施和设计的政策可能以制约“一带一路”为目标。

^① 谭浩：“中国能源项目如何布局‘一带一路’？”，FT中文网，2015年12月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160>）

然而，以下三种情形让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后应对政治风险挑战的任务比预期要更加复杂、艰巨。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当今世界的风险高发地。不管建设“一带一路”的意义和价值有多大，如何处理客观存在的各种政治风险及其对企业跨国经营带来的挑战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需严肃考虑和谨慎应对的问题。中亚、中东、北非等地区是“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国家动荡、战乱等似乎是很多人想到这些地区时总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印象。在国际主流评级机构多年的国家信用、国家风险评估当中，这些地区的分数一直不高。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地区后，肯定会遇到上述的各种政治不稳定及其导致的政治风险问题。而这些地区长期处在政治不稳定状态的现实将增大中国企业进入后防范政治风险的复杂性和成本。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过度高涨，但有的已超出自身能力限度。自“一带一路”设想提出以后，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与企业以极高的热情提出对接“一带一路”的方案，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发展机遇。对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而言，它们提出的对接方案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还有不小差距。有的地方政府参与“一带一路”的主要着眼点是利用中央政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而提出的配套政策，进行新一轮内部扩张，这与国家整体发展规划和方向有偏差。这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和方式，导致它们对政治风险这个企业跨国经营最重要的风险因素考虑不周。

最后，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来说，中国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引导、环境塑造和利益保护等方面。然而，受国家发展阶段等因素的限制，中国政府在以系统、专业的方式帮助企业应对政治风险方面仍亟须改善。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一直以积极的态度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在与沿线国家进行领导人互访、政府高层对话时通常会把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重头戏，很多国家也对此显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在“一带一路”具体项目进入落实阶段后，中国政府给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企业的帮助就显得不够充分，难以满足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多元化需求。特别是在政治风险的预警和防范、应对和化解等方面，中国官方可从多个层面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应对政治风险、规避损失。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重心在于同中亚、中东、东南亚、南亚、北非、欧洲等沿线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在推动沿线国家经济繁荣的同时实现中国在当地的利益。但是，中国企业要想把“一带一路”沿线打造成未来发展的“机遇带”，

就须有进入“风险带”的心理和政策准备，识别、辨析政治风险并提出应对策略就成为尤其紧迫的课题。

二、文献综述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国内外学界已关注到建设“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政治风险问题，但总的来看，仍十分缺乏系统、深入分析，从事“一带一路”政治风险问题研究的知识基础较弱。不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实施及前景是以相关主要领域的既有实践作为基础的，因此，“一带一路”的研究也可以从相关主要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中寻找支撑。具体地看，与“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研究相关的主要议题包括“一带一路”、政治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中亚研究”四大类。这四类主题的研究成果可为探讨“一带一路”政治风险问题提供素材和思路，它们构成了“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研究开展的重要基点。其中，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属于国际商务领域，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与“一带一路”政治风险问题联系密切。目前，“就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文献，更多的还是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外部宏观环境”，“一部分文献侧重于从区位选择的视角”研究，一部分文献主要从“母国制度质量和政策支持”等研究，“还有少量文献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特有的双边制度联系解读”。^①此类解读对研究“一带一路”政治风险是一种有益支撑。

（一）“一带一路”研究

根据作者统计，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文章中题名包括“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词汇的共有4501篇（参见表1）。从下表可以看出，“一带一路”相关研究从2014年开始大幅增长，2015年更呈现爆发态势。2013年“一带”、“一路”被分别提出之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比“丝绸之路经济带”启动得更早，2013年之前仅有2篇被收录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文章，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有240篇。但是，“一带”、“一路”被提出之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成果数量增长更快，2014年和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成果数量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2倍。

^① 参见黄翔、韩剑、张二震：《集聚优势与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2期，第117—118页。

表 1 中文期刊“一带一路”论文刊载数统计表

日期 项目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及 以前	总量
“一带一路”	2 308	170		0			2 478
“丝绸之路经 济带”	582	560	58	1	1	0	1 202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	291	273	17	20	16	204	821
	3 181	1 003	75	21	17	204	4 501
备注	本表统计数据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6 日						

通过文献比较可以发现，从国内发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是重点之一，而且目前越来越多针对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相关主题主要包括：中国国内发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比如西部大开发、国内各省份发展与“一带一路”；行业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比如，能源、对外贸易等^①；国内各部门工作与“一带一路”战略，比如，海关工作、金融工作等。^②从国际关系角度对“一带一路”进行解读是当前的重点研究路径，涉及的主题包括：中国外交与“一带一路”的关系；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外交关系，比如，中俄关系与“一带一路”^③；“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的新要求，如话语权构建问题等^④；中国推行“一带一路”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主要围绕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对当前和今后的国际秩序可能会造成何种影响等。^⑤

上述围绕“一带一路”展开的研究及取得的成果对理解“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但是，“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新提

① 代表性文献包括：张生玲等的《“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能源贸易与合作展望》（《国际贸易》2015年第8期）。

② 代表性文献包括：赵忠滨的《一带一路与银行国际化》（《中国金融》2015年第15期，第86页）；《海关与经贸研究》2015年第5期刊发《试探“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海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若干思考》《“一带一路”视角下青岛海关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与思考》3篇文章，讨论海关工作与“一带一路”的关系等。

③ 代表性文献包括：《中俄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与双边经贸合作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41–47页）。

④ 比如袁赛男的《构建“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下的新对外话语体系》（《对外传播》2015年第6期）、贺潇潇的《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网络传播的现状与对策——以中亚五国为例》（《对外传播》2015年第6期）、刘辰与刘欣路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共同价值观念培育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对外传播》2015年第7期）。

⑤ 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能够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的观点可以参见：王文、刘英在《“一带一路”完善国际治理体系》（《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6期，第57–66页）等文献。

出和推行的对外合作战略，相关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大量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未能形成较为系统、完善的理论框架。换言之，学界目前对“一带一路”的研究相对滞后。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学者与政府的思路和节奏存在差距，二是与企业的需求和推进步伐存在差距。

学者与政府思路和节奏存在差距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关于“‘一带一路’是否是一个战略”的争论经久不衰。在中国政府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学者们曾就“一带一路”是否是中国战略进行过大量争论，其中，既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的内容和框架不足以支持其成为战略，因为没有明确的步骤和机构等，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宣称“一带一路”时不宜过多将之称作战略，因为这会导致外方的疑虑和反对。这种争论持续过一段时间后稍微变弱，但是并没有消失。实际上，中国政府部门已经在大量官方文件中对“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政策倡议还是战略这个问题有过表述。尽管学界讨论更侧重于理论层面，但是，却也反映出学者对“一带一路”的部分思考滞后于政府节奏的现实，在部分学者仍为“一带一路”的属性进行争论时，政府实践已经铺开。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实践成为相关研究朝着更贴近具体工作的方向转变的推力。

学者与企业需求存在差异同样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对企业实际需求、投资现实情况、资本运作情况、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及社会的关系等了解不全面。而且，学者围绕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提出的很多建议流于空泛，可操作性比较低。当然，不同学科围绕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进行讨论时，专注于经济管理等领域研究的学者与专注于政治外交等领域研究的学者选取的重点和采用的方式会有不同。就政治风险问题而言，学者们的研究尚难以满足企业的现实需求。

学术讨论与社会实践存在差距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性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一带一路”研究当中。然而，在过去一段时期，该问题在“一带一路”相关研究中尤为明显。除上述的差距，“一带一路”研究还存在许多受批评的倾向或问题。有学者判定“一带一路”研究现状“乱象丛生”，对实际情况缺乏清晰认知而轻易做论断，对实际国情缺乏了解而做片面分析，对中国真实影响力过于高估而有盲目优越感。^①本书对此不加以赘述，而想强调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片面强调创新。

国际关系学界、经济学界等在提到如何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时往往会强调“创新”，似乎“创新”已经成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的终极捷径。不可

^① 参见王晋《“一带一路”研究乱象丛生》，《联合早报》，2015年5月26日。